

我国民族地区提升“社区韧性”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

柳建文

【摘要】“社区韧性”是社区应对各类灾害冲击的能力和灾后自我恢复的能力,具有重要的防灾减灾功能。近年来,国际减灾领域已形成一种超越“技术性要素”的广义的社区韧性理念,包括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认同感、社会组织、地方性知识和个体韧性。基于社区韧性营造的理论与实践,社区韧性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应将其内嵌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考虑一系列非技术性因素,从而能更为精准和有效地提升社区韧性。因此,我国民族地区应通过积极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促进邻里关系,激活和巩固社会资本;培育和发展社区互助组织、促进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复兴;重新审视和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防灾减灾知识,实现地方性知识体系与现代防灾技术的有效衔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启动社区减灾培训计划,增强个体韧性。

【关键词】灾害风险;社区韧性;社会资本;地方性知识

【作者简介】柳建文,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呼和浩特),2021.5.168~17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型调查数据基础上中国城镇社区结构异质性及其基层治理研究”(编号:15ZDB173)。

一、研究缘起

我国是世界上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防灾减灾任务严峻。从自然条件上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大多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高寒山区,气候变化多端,地质活动频繁,属于各类灾害多发的区域。从经济发展上看,很多民族地区仍以农牧业为主,抗灾能力较弱,因灾致贫、因灾返贫问题尤为突出。此外,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公共应急资源配置成本高,救灾难度大。总体而言,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相对较高。所谓“社会脆弱性”,是指因社会人口特征导致的灾害破坏程度的大小,反映出受灾害影响的社会群体或区域的不均衡性。作为人类生活的社会性聚落,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至关重要。2005年,世界减灾会议通过了《构建国家与社区应对灾害的韧性行动纲领》,强调从预防、整

备、反应、恢复等环节增强社区韧性。增强社区韧性意味着社区在灾害来临之际能够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且有能力在较短时间恢复社区的主要运转功能。

我国非常重视社区的防灾减灾工作。2008年,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制定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①,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选活动。根据民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公示名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数量已经达到12536个。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沿线地区,仅广州市就有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202个,而民族地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数量相对较少,例如内蒙古阿拉善地区、青海玉树地区、新疆阿勒泰地区、西藏阿里地区等多灾易灾地区

的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数量平均不到10个。^②一项关于区域城市韧性的评价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韧性指数为0.198,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高的西部地区城市的平均韧性指数只有0.128,区域平均韧性指数最低。^[1]

基于社区韧性营造的理论与实践,社区韧性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应将其内嵌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考虑一系列非技术性因素,从而能更为精准和有效地提升社区韧性。本文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的特点,将非技术性因素与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结合起来,探讨提升社区韧性的具体思路,以期为增强民族地区的抗灾减灾能力提供多元化的路径。

二、社区韧性营造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

(一)防灾思路的社会转向

首先,技术并不完全有效。人类早期的减灾计划主要关注生存环境所能承受灾害风险的强度,如建筑物的抗震等级、排水系统的泄洪量等。实践表明,过于偏重于用技术手段预防灾害而忽视社会维度的干预会导致突发事件和灾害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1986年,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其后采取的大量技术手段无法控制灾害的蔓延。同年,美国夏威夷海啸预警中心共发出20次海啸警报,但其中15次预警都没有发生海啸。20世纪80年代,针对技术性减灾规划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灾害理解范式,认为洪水、地震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与其相关的灾难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和社会行为紧密相关的。“对许多灾害来说,科学家们只能提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能预报出特定的发生时间、强度和受影响的准确社区。在人民不能受益于可靠的气象水灾警报的乡村地区,当地居民应更多地考虑他们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解和知识。其他非技术的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包括加强预报者个人技能和加强公众对灾害现象的原因和发展的理解。”^{[2](P.40)}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灾害,人们有必要把

眼光集中于技术以外的社会性因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柏林(Bolin)等人对1994年美国洛杉矶北岭大地震的分析。他们发现,人们并未因采取了大量“技术性”措施而降低地震对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部分原有住民以极其自然的方式应对灾害,反而比那些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社区和居民更能经受灾害的冲击。据此,他们提出了“灾害—社会互动论”,认为灾害的演化方向往往取决于极端事件与人类住区之间的互动,通过加强住区预测灾害的能力和调整社会组织的行为可以减轻灾害带来的冲击。^{[3](PP.89~112)}其后,以哈里·摩尔(Harry E. Moore)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灾害亚文化”(Disaster Subculture)的理论分析模型,即从群体文化视角和灾害的社会建构过程出发,着重了解灾民的经历、感受、思想和话语,分析社会权力、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文化习俗、价值观与信仰等文化变量对灾难形成的影响,即灾害亚文化贯穿于社区的灾前防范、灾中应急和灾后恢复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卡尔(Carr)甚至指出,灾害的形成是文化和社会功能无法继续发挥作用的结果。某些灾害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恰恰是因为社区文化保护功能的弱化和“崩溃”(Cultural Collapse)。^[4]

其次,各类风险应对都与社区相关。根据“灾害—社会互动论”的观点,灾害源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影响,应对灾害的最优策略包含技术和社会双重路径。如果仅将防灾减灾视为一个不关注社区层面的技术项目,将无法增强人们的抗灾能力。特别是当灾害突然来临并大规模扩散时应变与救助的时间很短,加之政府的能力和资源有限,社区的自救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在人类应对风险的历史中,除了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技术性防灾减灾行动外,我们还经常看到一种自发的、经验性的社会化减灾行动,它们大多由家庭或社区发动,却可以有效地减轻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冲击。

最后,灾害应对需要关注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生活模式的多样性。早期的防灾手段倾向于将灾害

受众视为同质性的整体,在技术和政策设计上带有“一致性导向”(Consensus-Oriented)的特点,缺乏对群体和社区多样性的关注。1958年,哈里·摩尔在《龙卷风席卷下的得克萨斯州》一书中探讨了灾害过程中群体不平衡的现象,即得克萨斯州的黑人和墨西哥裔的受灾程度远远超过同地区的白人群体。^{[5](P.10)}1994年,布莱克(Blake)等人通过大量案例详细地讨论了自然灾害风险与群体的脆弱性(People's Vulnerability)。脆弱性群体通常是指一些社会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弱势群体,他们对风险的感知较为迟钝,应对灾害的态度相对消极。^[6]苏珊·卡特(Susan L. Cutter)最早针对美国不同地区和族群的经济人文特点建立了“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指数”(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SoVI)。卡特认为,种族和族群对社会脆弱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差异、资源的匮乏以及社会与经济的边缘化。其中,有关种族和族群的测量指标包括社区内非裔美国人的占比、土著美国人的占比、亚裔美国人的占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占比等。^[7]由于每一个群体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中应对自然灾害,拥有不同的风险场景,因此他们对灾害的适应方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和地方特征。例如,美国灾区的越南裔群体在特有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仅能迅速撤离现场,而且在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集体行动能力。^[8]随着群体差异性认知的确立,有关灾害应对的社会相关性分析(包括社会分层、收入、种族、族群、性别的影响等研究议题)逐渐展开。^[9]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性指标和概念的引入,社区韧性理念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社区韧性的提出

“韧性”(Resilience)最早被视为物体受到干扰后恢复原初状态的能力,亦被称为弹性或复原力。米勒特(Mileti)最早将灾害防控与社区相结合提出社区韧性(Resilience of Community)概念,“是指社区的生产、生活在经受灾害冲击后没有遭到致命破坏,并在不需要大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即可复原的一种能

力”^{[9](P.32~33)}。其后,韧性概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社区能够适应风险或从中迅速恢复的社会、文化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LINC模型”(Local Initiative for Neighborhood Circulation)强调社区的内在抗灾力量,鼓励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文化传统、社交网络、邻里组织),而非仅仅依靠基础设施或技术来应对灾害风险。LINC模型主张由社区成员辨识、衡量和判断风险,将减轻灾害的最终决策权授予社区,使社区能够延续先辈们积累的应对灾害的文化与精神,增强其防灾抗灾的韧性和独立性。目前,LINC模型已被成功地应用于美国、塞尔维亚、日本、南非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风险应对。在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后,南投县南港村通过再造“鹿神祭”的文化展演活动将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叙述传递下去,成为未来人们防范应对灾害的重要经验。^[10]

(三)社区韧性中的社会性要素

在对灾害的社会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阿伯哈斯·杰哈(Abhas K. Jha)等人进一步阐述了社区韧性包括基础设施韧性(Infrastructural resilience)、制度韧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和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四个方面。其中,社会韧性被视为社区文化传统、人口特征、组织结构方式以及社会资本等要素的集合。^[11]

1.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由人际关系网络和信任所产生的资源,具有利他主义特点,能够促成群体的互利合作行为。在个人主义日渐盛行的时代,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社区抗击灾害的重要资源。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案例显示出社会资本较强的社区在面对灾害时所具有的优势。1999年,加拉加斯突发洪水和滑坡,“随着洪水肆虐,社区成员动员起来互帮互助。邻居之间已经熟识和合作多年,他们迅速地传递着水位上涨的消息。年轻居民帮助老年居民从他们的居所搬离。当一些人因为不相信洪水威胁的存在或是担忧他们的少量财物被偷而不愿离开时,邻居破门而入并强迫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12](P.77)}。诺里斯(Norris)等人在评估社区

韧性时指出,灾害深深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它的显著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断裂,而社会资本有助于重塑社区的社会结构,具有“自我复原”(Therapeutic)的特征。^[13]研究者还发现,“受灾者精神压力的大小与社会关系网络状况的变化之间存在紧密相关,如果受灾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因灾害而受到严重破坏,则受灾者很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14](P.29)}。

由于社区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而成的群体组织,因而社区中的行为准则不同于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个人追逐私利,而社区的组织原则是保证其所有成员的生计而互相帮助。人类学家麦凯布在肯尼亚西北部图尔卡纳南部地区调查发现,当地经常面临着极端干旱的威胁,每一位图尔卡纳的游牧民家庭都拥有一张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困境。^[15]美国学者康福特经过多年的地震灾情研究,进一步提出社区依附感和认同感在灾害应对中的重要性,由于社区中的所有居民都共担风险危机和减灾的责任,因此应对灾害威胁需要居民对社区具有较强的依附感和认同感。^[16]同时,社区认同感也是影响灾后社区恢复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最近一项关于非洲六国贫民窟的调查研究中,国际救灾组织“行动援助”(Action Aid)发现,“灾后社区认同感越强,重组能力越强”^[17]。近年来,国外在推进城市韧性建设过程中将促进不同族群的邻里关系和社区认同纳入社区韧性建设目标,以此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

2.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具有公共性和利他性,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本、促进社区的凝聚力。特通(Turton)对埃塞俄比亚西南莫西地区的原住民应对干旱风险的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当地原住民善于通过社会组织拓展社会关系,从而抵御风险和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8]由于地处东非最干旱的地区,长期以来肯尼亚有大量的社区自助组织,在灾害来临时,这些自助组织会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援助。大多数自助组织建有用于灾害救助的“轮转基金”(ROSCAs),也被称为“旋转木马”,即轮流为大家服务的意思。^{[19](P.379)}

瓦兰斯(Vallance)等人对社区组织在灾后重建和降低灾害风险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当地社团可以充当中介在居民和外来行动者之间传递信息,这些社团也能分享关于当地习俗、环境灾害、社会脆弱性和抗灾力方面的信息。这使得社区对灾害的反应更为迅速和有效。^[20]由于社会组织成员大多是社区居民,他们熟悉社区的状况和设施以及社区风险的分布,特别是在政府救助资源有限的地方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有效减少灾害损失。实践中,各国均重视培育减灾功能的社区志愿组织。例如,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在1997年建立了社区危机反应团队(CERT)并直接给予其资金帮助和技术培训。在灾害发生时,CERT能够迅速地将志愿者组织起来向居民提供援助。目前,美国城镇社区的自主防灾组织率接近100%。与此类似的社区自助组织还有日本的“民生委员会”、英国的“社区睦邻小组”、法国的“社区救援组织”和北欧国家发展起来的“邻里守望组织”等。在日本灾后的救援主体中,自治会、民生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占比超过六成,主要负责实施日常防灾训练、救助弱势群体、灾后避难所运营等。^{[21](P.45)}特别是在政府救助资源有限的地方,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大量减少灾害损失。例如,1999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当地社区组织挽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国际援助组织十分赞赏他们在确定救援先后次序和重建方面行动的准确和高效。^{[12](P.77)}

3. 地方性知识 长久以来,面临风险的人类社会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韧性。地方的适应性策略、文化遗产、知识与经验都是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使地方形成了界限明确、具有自身文化性特征的区域。埃文思通过对尼罗河畔“努尔人”的调查发现,努尔人的社区分布具有季节性收缩的特点和广泛的相互依赖性。这些社区在雨季时彼此分离,在旱季则与村落社区混合到一起,共享水、牧草和鱼类资源。旱情越严重,努尔人越倾向于采取聚集收缩的居住方式增强社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化他们

对部落——“娄”——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感。尼罗河畔旱季常常会发生牛瘟,为了避免瘟疫导致牛全部死掉,努尔人把牛放养在两个或更多的地方。^{[22](P.159)}帕特森(Patterson)在研究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时发现,早期的风险预警和应对知识越本土化,社区的韧性就越强。例如,犹太人社区有自己的一套非正式救助系统,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害的冲击。^[23]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技术专家们在住房和基础设施重建项目中达成了一项共识,即当本土建筑的设计形式被证明对于风险具有韧性的时候,就应当予以优先考虑。^{[24](PP.106~107)}戴维斯(Davis)等人对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后“东正教”在损毁严重的爱斯基摩人社区重建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性文化,它能克服灾民惊慌失措、孤苦无依的心理,对缓解灾民的精神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25](PP.125~146)}

国际经验表明,早期的预警和应对知识越本土化,社区的韧性就越强。由于地方性知识对减轻自然灾害具有积极功能,因此在灾害应对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受灾群众的文化特征,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1994年,第一次世界减灾大会提出了一系列急需加强研究的重点任务,包括挖掘、利用本土知识和习俗(Traditional/Lo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s)的减灾意义与价值等。人类学家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h Hoffmann)强调,如果一个族群的文化能够被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到应对风险和灾后重建中,那么这将有利于打造一个更具韧性的社区。^[26]实践中,“个人与家庭的个体经验、社区内外的口口相传,在描述安全威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多数案例中,居民能够使用当地知识确定问题的起因和风险的位置。”^{[12](P.19)}目前,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参与式风险评估”(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s)、“风险和承受力评估”(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和“参与式脆弱性分析”(Participatory Vulnerability Analysis)等方法都源于对传统地方性知识的认可,这已成为增强社区韧性的重要手段。

4. 个体韧性 “在风险来临时,个体或社区均有一定程度的韧性。个体的韧性指的是他们维持生存的基本价值标准和维持生计的手段。”^[27]近年来,社区韧性研究已经从社区结构、社区组织逐渐转移到关注个人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英国伦敦的牛津灾难研究中心对公众进行火灾防范意识的训练;印度政府和联合国发展署合作开展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旨在给民众提供灾害防护教育,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在拉丁美洲,国际红十字会、泛美健康组织、红新月会和行动援助等国际组织把降低飓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风险的培训融入家庭和居民的健康事务之中,包括制作社区的灾害地图和疏散路线图,通过虚拟桌面开展居民疏散演习,提高居民疏散时的响应速度和步行速度,增强个体缓解风险的互助意识等。

伴随灾害研究从技术决定论向社会人文导向的转变,社会、文化等非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特别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使得人们对社区韧性的探索扩展到地方性元素和族群因素,从而形成了一种广义的社区韧性理念,并被运用到多种灾害情境之中(详见下页图1)。

三、我国民族地区社区韧性营造的非技术策略

“韧性”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重维度。中国民族文化和生存环境呈多元化特征,各民族的风险意识和应对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由于民族地区的应急资源和技术水平有限,因而需要激发和利用内生性的传统防灾资源,民族地区社区韧性的营造应考虑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和风险场景,更加重视对非技术性策略的应用。

(一)巩固和提升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主要来自血缘和地缘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主义及其扩展出的亲属关系结构所强调的以集体利益为重的社群主义通常被认为是防范灾害冲击的有利因素。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邻之间积极互助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很常见。“一般地讲,生产力越落后,交通工具越不发达,地缘关

系就越牢固,其社会作用也越重要。”^{[28](P.41)}例如,独龙族长期保留着集体采集的生产方式。每年三月以后,家族或头人就会率领族人到山上采集各种野菜、野果,采后平均分配,没有采到的人同样也可以分得一份。这一习俗被称之为“共食制”,已经成为社区习惯法,谁家杀牛宰猪都必须将肉分给大家吃,否则被视为“发吾元”(即小气鬼)而在社区内受到冷遇。鄂伦春族每三四家至十家左右组成一个血缘家族公社——“乌力楞”。乌力楞集体捕获的野兽和兽皮各户会平均分配,对鳏寡孤独一视同仁,这种“帮食”习俗被认为是乌力楞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时至今日,“在藏族聚居的牧区或农区,邻居间总能和睦相处,少有矛盾和纠纷。邻居发生矛盾,对方突然出现不幸事件时,另一方会毫不迟疑,不惜牺牲一切去帮助。因为他们看不起幸灾乐祸的人”^{[29](P.241)}。当青海省果洛、玉树、黄南等藏族牧区发生雪灾时,牧民可向非受灾牧户租借牲畜,定期归还(多为3~5年),而繁殖所得则留归自己。这种带有帮扶性质的互助行为对恢复灾区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30]此外,民族地区的建筑形式也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居民在生产

生活上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羌族的传统民居通过平面或纵向的梯道相连接,寨内巷道纵横,看上去各家各户单门独院,实则相互连通,构成了一个“比肩且连根”的族群空间关系网络,成为羌族社区克服灾难危机的本土化社会资源和增强地方韧性的重要基础。^{[31](P.88)}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下,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着变化,以个体和家庭利益优先的行动逻辑改变着原有的社会网络,生活中的互助范围由社区、邻里逐渐缩小到家庭,对他人的依赖减少,对政府救济的依赖逐步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原有的韧性和抵御灾害的能力。^[32]社会资本是社区居民紧密互动的产物,民族地区需要积极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激活和巩固原有的社会资本。目前,一些地方在城市改造和社区重建中采取“原有拆迁居民整体回迁”的方式来维持地方社群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以防止社会资本流失。此外,巩固社会资本还需注意协调多民族社区内的邻里关系。在多民族社区,和谐的族际关系是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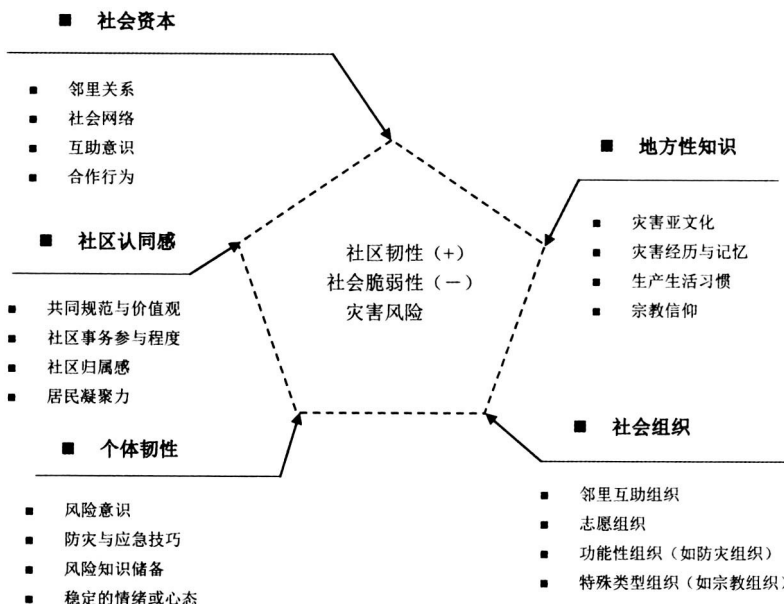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韧性的广义理念

注:“+”表示非技术性要素与社区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表示非技术性要素与社会脆弱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的社会资本。例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三大主体民族(汉族、藏族和回族)为防范冰雹灾害共同联手组建了跨族群的青苗会、护林和防雹合作行动,表现出跨族群认同与团结抗击自然灾害的族群联合行动特征。^[33]

(二)培育和发展社区互助组织

为了抵御灾害风险,人数较少的民族大多有抱团生存的特点。历史上,我国的少数民族自发地形成很多跨越家庭的社区互助组织。例如,新疆哈萨克族牧区的两种农业互助组织“乌云木”和“昌英赛里克”;藏族社会生活中以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区互助组织“措哇”“比瓜把”(汉语意为“兄弟帮”或“兄弟会”);彝族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社会组织“家支”等。这些社区互助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亲戚邻里之间的互助协作,当面临突发性自然灾害时,这些社区组织能够合理地分配有限资源,组织居民开展互救,增强单个家庭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生产形式的变革,传统的社区互助组织日益减少。目前,“乌云木”“昌英赛里克”“措哇”等传统互助组织已被现代行政组织所取代,“家支”这种具有彝族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不复存在,民族地区单个家庭不得不孤立地面对灾害风险,他们的社会脆弱性进一步加剧。社会学家哈迪斯蒂指出,社会组织在人类应对灾害的历史进程中表现突出,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有效应对偶然突发事件的缓冲器。^{[34](P.77)}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民族地区,社区互助组织是营造社区韧性的重要社会资源。在民族地区,人们受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影响仍然较大,这有利于民间互助组织的复兴。近年来,民族地区一些牧区以传统互助形式为基础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建立了“草业合作社”“畜牧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和“奶食品加工合作社”等互助组织,但大多数互助组织因资金周转困难和专业人员不足而步履艰难,需要政府加强资源统筹予以扶持。

(三)注重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利用

罗康隆等人在对苗族群众治理石漠化灾害的研究中提出了“减灾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指出“减灾地方性知识”是当地人对于生存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和生态智慧。当灾害来临时,本土的减灾知识首先发挥作用。^[35]李永祥探讨了傣族对泥石流灾害的应对方式,认为傣族传统知识对于灾害的预防和回应产生了重大影响。傣族人大多生活在河谷地区,拥有预防洪水的传统知识和方法。^[36]彝族的民间谚语“尔比”中有大量如“正月无降水,六月有暴雨”“降雨之前必起旋风,洪水之前必冒水泡”“地将震来牲畜惊”等关于灾害预测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气象台曾结合当地牧民的经验建立了冬季雪情预报方法。牧民应对灾害和不确定性风险有多种策略,如“转场”“轮季放牧”“浅牧”“返青”和“不动土”等。一些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是应对当地自然灾害风险的最佳形态。例如,羌族在岷江上游地震高发区生活多年,其传统建筑全用木材、竹草等轻质材料建成,各层楼梁纵横错开、相互牵制、分散均匀受力,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由于当地的房屋建筑多为木质结构,为了提醒村民注意防火,一些少数民族还形成了诸如“扫寨”的传统习俗。“扫寨”又称“退火殃”,是苗族最重要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每隔两到三年举行一次。在“扫寨”时,每家每户的火塘全部用水熄灭,目的是把引发火灾的“火殃鬼”赶出寨子,强化了人们的防火意识。

灾害不仅仅会危及民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还会造成民众极大的心理创伤。李亦园在谈及台湾雅美族人的灵魂信仰时强调其在灾害来临时具有稳定社会心态和防止社会解体的积极功能。^{[37](P.194)}云南红河州哈尼族村寨在面临意外灾难时举行的驱灾叫魂仪式可以消除受灾当事人的焦虑,与现代技术性心理干预手段相比具有更好的自我疗愈效果。^[38]在青海玉树地震后,受佛教生死轮回思想的影响,藏族民众更多地表现出安定和坦然的心态。与其他受灾地区民众的心理状态相比,玉树民众在

震后情绪与信心恢复变量上的得分率最高。^[39]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提出“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策群防”的防灾思路,取得了宝贵经验。然而,在技术理性的主导下,近年来我国很多民族地区应对灾害的传统策略遭到废弃。例如,牧民们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游牧传统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而被改造,使一些地区诱发并加剧了草场退化。可见,忽略了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化防灾技术手段难以与民族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契合,反而可能会导致技术与制度的本土化适用困境。^[40]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防灾减灾知识,在完善技术手段的同时,积极挖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本土资源与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有效衔接,构建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社区防灾减灾机制。具体而言,在开展社区灾害风险识别评估、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的过程中,应积极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探索建立社区减灾规划的社会化评估机制。

(四)增强个体韧性

国务院在《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进社区、进家庭。民族地区应针对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制定灵活多样的宣讲政策和行动计划,把现代防灾减灾知识以不同的群体偏好的方式进行传播。例如,长期活跃在内蒙古的草原轻骑兵综合志愿服务队“乌兰牧骑”在偏远农村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了大量的防灾科普知识理论宣讲,增强了牧民的风险意识和防控能力。

近年来,国际社会启动了大量减灾培训计划,其中很多项目直接针对个人防灾意识和避灾技能的提升。例如,联合国灾害管理培训计划通过远程教育实施了许多社区培训项目,使约6000名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者受益。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亚洲六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社区减灾项目。此外,国际防灾复兴机构、亚洲减灾中心和亚洲备灾中心等国际组织均致力于分享防灾管理经验、提高公众的防灾意

识和技能。他们定期提供免费的短期专业培训,包括地震脆弱性评估、洪水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火灾风险管理以及医院应急准备等内容。近期,国际救援组织“世界宣明会”在一些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帮助社区制定应急规划,并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办讲座等提高社区居民的防地震和防火灾意识。2011年,四川绵阳市与国际美慈组织合作在“5·12”地震灾区北川县10个社区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社区主导的防灾减灾”项目(CDRR),重点开展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使累计1万多人受益。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这些社区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响应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明显加强。可见,民族地区应积极开展社区防灾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国际资源加强社区居民培训,以提升民族地区个体层面的韧性。

结语

近年来,随着自然风险和灾害的日益增多,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社区韧性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表明,社区韧性水平主要取决于技术性因素和非技术性因素两方面。前者包括与防灾救灾相关的基础设施、科学仪器、信息软件等,后者则涉及社区的文化背景、居民的价值观和信仰、社区组织的形态以及个体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与风险意识等。其中,非技术性因素直接影响到社区应对灾害的方式和能力,特别是对农村乡镇聚落和原住民部落而言,他们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居民的生活习性、文化和生存条件与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存在很大差别,一般性的防灾抗灾技术很难完全适用于这些社区。^[41]

“灾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界的破坏性力量,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与其脆弱性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破坏事件。”^{[42](p.27)}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现代社会的灾害风险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因此,要从根源上应对和消除风险,应当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交往行为、社会变迁等非技术性的角度出发。由于我国民族地

区处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中,社区的风险应对和防灾减灾有其特殊性,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非技术性因素在其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该评价标准包括减灾组织管理机制、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援预案、减灾宣传教育与培训、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居民减灾意识与技能、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管理考核等。

②参见《2020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公示公告》, https://www.mem.gov.cn/gk/zf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07_379798.shtml, 2020年2月7日, 2021年5月15日。

③代表性文献包括匹考克(Peacock)等人所著的《社会体系、生态网络与灾害》、安德鲁(Andrew)的《飓风:种族、性别与灾害社会学》、戴尔逊(Dyson)的《卡特里娜飓风与灾害的肤色》和柏林(Bolin)等人的《种族、阶级、族群与灾害的脆弱性》等。

参考文献:

- [1]李亚.我国城市灾害韧性评估及其提升策略研究[J].规划师,2017,(8).
- [2]联合国救灾署办公室编.预防和减轻灾害的社会和社会学问题[M].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989.
- [3]Robert Bolin, Lois Stanford. Constructing Vulnerability in the First World: The Northridge Earthquak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1994[A]. Anthony Oliver-Smith, Susanna Hoffman. 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4]Carr Lowell Julliard. Disaster and the Sequence-pattern Concept of Social 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2, (38).
- [5]Harry Estill Moore. Tornadoes over Texas: A Study of Waco and San Angelo in Disaster[M]. Tex. University Press, 1958.
- [6]Piers Blaikie, et al..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7]Susan Cutter.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3, (2).
- [8]Anthony Joseph Marsella, et al.. Ethno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Disaster and Trauma[J]. Disaster Prevention & Management, 2012, (1).
- [9]Dennis Mileti. Disasters by Design: A Reassessment of Natural Haz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M]. Washington, D. C.: Joseph Henry Press, 1999.
- [10]Ferid Agani, Judith Landau. Community-Build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imes of Traum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NC Model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Kosovo[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10, (1).
- [11]Abbas K. Jha, et al..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Principles, Tools, and Practice,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The World Bank[R]. No. 13109, 2013, August.
- [12]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Z].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 [13]Fran H. Norris,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8, (1-2).
- [14]李琳.灾后社会资本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5]杰·特伦斯·麦凯布,刘源.图尔卡纳游牧民对于干旱的冲击与回应:人类学理论和灾害研究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 [16]戴维·R.戈德沙尔克,许婵.城市减灾:创建韧性城市[J].国际城市规划,2015,(2).
- [17]周利敏.迈向韧性城市的灾害治理——基于多案例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5).
- [18]李永祥.傈僳族社区对于干旱灾害的回应及人类学分析[J].民族研究,2012,(6).
- [19]格瑞泰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20]杨敏行.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J].城市规划学刊,2016,(1).
- [21]胡俊锋.亚洲自然灾害管理体制机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 [22]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23]Olivia Patterson, et al..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Disaster Response: Conceptual Models[J]. Population Research & Policy Review, 2010, (29).
- [24]杨贵庆.城市社会心理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
- [25]Davis, Nancy Yaw. The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Five Pacific Eskimo Villages as Revealed by the Earthquake[R]. The Great Alaska Earthquake of 1964: Human Ecology Volume[R].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0.

[26]苏珊娜·霍夫曼. 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和文化要素的探讨[J]. 民族学刊, 2015, (4).

[27]Christopher G. Burton. A Validation of Metrics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Hazards and Disasters Using the Recovery from Hurricane Katrina as a Case Stud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1).

[28]顾朝林. 城市社会学[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9]贾春增. 民族社会学概论[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30]扎洛. 雪灾与救助——青海南部藏族牧区的案例分析[J]. 民族研究, 2010, (6).

[31]郭跃. 自然灾害与社会易损性[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2]张倩. 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J]. 社会学研究, 2011, (6).

[33]庄孔韶. 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 (5).

[34]唐纳德·L. 哈迪斯蒂. 生态人类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35]罗康隆, 等. 论苗族传统知识在贵州麻山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J]. 资源与生态学报(英文版), 2011, (1).

[36]李永祥. 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J]. 民族研究, 2011, (2).

[37]李亦园. 文化与行为[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3.

[38]罗丹. 传统的“撤离”与未来的拓殖: 一场哈尼族驱火灾仪式的人类学思考[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18, (5).

[39]张文佳. 藏区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特点[D]. 北京: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2013.

[40]张原. 藏彝走廊的自然灾害与灾难应对本土实践的人类学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

[41]Susan L. Cutter, et al.. Emrich.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Disaster Resilience[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6, (6).

[42]Susanna M. Hoffman, Anthony Oliver-Smith. Catastrophe &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M].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2.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Improv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Ethnic Areas of China

Liu Jianwen

Abstract: Community resilience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communities to respond to various disasters and self-recovery after disasters, and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has formed a broad concept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hat transcends technical elements, includ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identity, social organization, local knowledge,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creation, community resilience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issue, it should be embedded in the lo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a series of non-technica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so as to improve community resilience more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Therefore, my country's ethnic areas should actively organize community activities to promot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and activate and consolidate social capital; cultivate and develop community mutual-aid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non-governmental mutual-aid organizations; re-examine and excavate the knowledg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containe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o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modern disaster prevention technology; make full use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to launch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training programs to enhance individual resilience.

Key words: disaster risk; community resilience; social capital; local knowledge